法国大革命在德国：欢呼到反思

□林雅华

法国大革命犹如一颗星辰，闪烁于现代性的开端之上，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人物都无法绕过的话题。对于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来说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其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可以说，当其着手将埃德蒙·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翻译成德文之始，命运之门就已经把他推到了欧洲政治的风口浪尖。这一场革命不仅促成了他对理性主义和自由的反思，也初步构成了其保守主义的政治取向。

根茨在柯尼斯堡大学师从康德，最初受到了康德哲学的重大影响，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度也如激进青年一般为之欢呼雀跃，但是当1790年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出版之后，他的政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用审慎的视角来考察这一场革命。1793年，根茨将《反思法国大革命》翻译成了德文。在其中，根茨几乎将柏克视为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柏克政见的心悦诚服。同柏克一样，根茨此时不再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场民主革命，而认为它是一场反对传统、反对权威的暴力运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次脱离现实的实验。根茨的这种态度，使得早先他的很多崇拜者认为他背叛了民主的信条。不过，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专政后的种种血腥屠杀，乃至于波旁王朝的复辟、拿破仑的称帝，似乎都展示了这场大革命的恐怖面相。因此，根茨在译作完成之后，又创办了一份杂志——《历史月刊》（Historisches Journal）。在这份刊物上，他接连发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本源和特性》《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政治状况》《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比较》等多篇重要文章。在其中，根茨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从自由的分歧以及传统的保存等方面拓展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可以说，他深刻地洞察到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承诺背后所隐藏的逻辑悖论。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在于过度强调启蒙理性的作用。当理性变成了政客们借以摧毁一切传统与信仰、摧毁一切社会关系的武器之时；当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依赖于暴力强制、甚至肉体消灭而进行之时，理性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血流成河的断头台，已然宣告了自由的沦丧与社会的崩塌。

通过对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的翻译，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特征及其与欧洲整体政治状况、与美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考察和思考，根茨逐步地将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系统地引入了德语世界。我们知道，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生有两个源头，一是外部的，一是内部的。从外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主要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柏克思想的激发；从内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则与德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历史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根茨身上，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两条保守主义线路逐步生发与发展的过程。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外部的原因。柏克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植物或者动物，而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器官，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生存的条件而加诸其身的。这种混合了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观点，从英国传到了德意志，而最早翻译柏克著作的根茨则毫无疑问地从中汲取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此外，在担任奥地利政府秘书之前，根茨曾有过一次伦敦之行，在那里，根茨对这个在现代化程度上远远超过普鲁士的国家——英国——表现出了由衷的羡慕和赞叹之意，英国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强烈地吸引了年轻的根茨。保守主义的政见就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而从内部来看，我们发现德意志处于欧洲发展转化的中心，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反对法国的集结地，正是因为它对历史和传统的延续性情有独钟。相较于依据理性原则突然建立起来的“人为”社会，德国更加青睐通过逐步演化、形成进而稳定下来的有机共同体。因此，这个民族更为注重的是一种传统而保守的变革方式。当然，这种保守并非为了维护旧有的政治制度或者贵族利益，而是为了保存那些在民众中沉淀下来的价值、习俗乃至不自觉的选择，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生活形态。根茨出生于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模式之中，其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自然成为了他观察世界的不自觉方式。

在这内外两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根茨的思想开始了一种保守主义的转向。这几乎表征了当时欧洲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在法国大革命后续的恐怖与暴力中，在原本明朗耀眼的理性、自由、民主的光辉之下，似乎出现了无法摆脱的灰色暗影。当然，这样一种转向不仅体现在抽象的哲学理念上，同样也体现在具体的政治观念上。对根茨来说，学习英国的政治制度，运用政治均势原则，创立一个和平有序的欧洲体系，是抵制拿破仑霸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他作为会议秘书长做了一个重要报告，提出重整欧洲政治秩序、创建欧洲联合体的主张：“为了清理20年的废墟，并重新分配领土战利品，最明智的做法是搁下平时的小争端，共同支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准则。此外，今后任何大规模的欧洲战争都是无法容忍的……（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欧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欧洲的联合体（Federal Constitution）。”在通常的历史叙事中，维也纳会议往往因其忽略民族主义，牺牲小国利益以保持大国势力均势，乃至试图恢复欧洲的旧有秩序，而被许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维也纳会议上所形成的欧洲协调合作的常规架构、对战败国的温和处理、废除奴隶买卖、开放国际河流等措施，确实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了一个和平的系统，并对重建和平及欧洲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根茨在此次会议中所提倡的建立欧洲协调机制与欧洲联合体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保守主义理念的一次政治实践。而后续欧洲的发展，也基本上遵循了他的这一理想建构。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结束后不久，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起提议，加上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复议，这三国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签署了《神圣同盟宣言》。这一宣言的宗旨是，根据神圣的基督教义处理三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宣布“三国属于上帝统治下的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三国君主以手足之情互相救援”。此外，它还强调各国的人民和兵士，都应当出于和平正义的原则，遵守教义、保卫宗教，并且应当竭尽所能地保护神圣同盟的稳固。在这三国缔结同盟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八也加入了同盟。随后欧洲各国的君主，除了英国摄政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及教皇外，都纷纷加入了同盟，神圣同盟宣言的效力几乎横贯了整个欧洲。这一同盟的创建虽然不是维也纳会议直接讨论的内容，但是，它与会上所提倡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及创建欧洲共同体的主张紧密相关。神圣同盟的正式确立，让根茨格外振奋——因为，“欧洲终于在它自己所创立的最高法院的主持下统一了起来，似乎已经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家庭”。更加令他高兴的是，神圣同盟还确立了一整套关于国际组织监控、管制、制裁的相关条款以及一些调节双边或多边行为的程序、规则、规范与惯例。这些制度的存在将有力地预防一国专制和暴政的存在，从而推进整个欧洲的和平进程。

然而，根茨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依托于大国力量联合起众多国家的联盟体制，仍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损害和平的消极一面。“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占优势是一种事实，正如在国内社会中大的经济组织占优势是一种事实一样。除非摧毁这种优势权力本身，否则，任何法律或组织结构上的措施与设计，都无法消除这种权力差异所引发的政治后果。”也就是说，在国家实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果实力强大的国家在行为上不受节制地僭越国家主权，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则无法行使自己的国家主权，这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神圣同盟内部的这些问题，是根茨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根本无力解决的。虽然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不断地向各国君主警示同盟内部可能出现的危机，但是，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平衡方式，只能抱憾离世。

总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一样，根茨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转向了保守主义的立场，进而通过自己的政治努力，去营造一个破除法国专制霸权、促进欧洲和平的协调机制。他所主张的欧洲联合体，虽然打着欧洲均势的古典旗号，但实际上想要创立的却是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共同体。在其影响下，神圣同盟得以建立。这是欧洲君主试图以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机构管理世界、抑制战争、实现和平的一次重要尝试，也可以被称为人类建立世界政府维护和平的第一次试验。虽然神圣同盟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给大国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差别是一种难以消除的国际政治现实，但是这样一场华丽而真实的政治盛宴毕竟给根茨一生的政治事业画上了一个留待后世点评的句号，实践了他用保守主义的主张，反对独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梦想。

中外制度史

苏联领导人拒绝改革的后果

□刘金东　徐元宫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颇多的深刻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突出表现之一是长期拒绝改革。

以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集体农庄制度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尽管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集体农庄的过程中就遭受了农民反抗，但是，苏联政府还是通过强制手段推行了这一制度。由于集体农庄里的农民既无权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怎样分配，且生活困顿，所以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低落，农村和农业潜藏着严重危机，广大农民期盼集体农庄能被解散，自己能自主地拥有生产资料。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以及战争结束初期，广大民众期盼改变现状、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愈发强烈，因为千千万万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走出国门亲自领略了其他国家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对比这些国家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使得广大红军官兵思变的愿望愈加炽烈。一些苏联公民甚至直接向苏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时苏联集体农庄的真实状况。比如，斯摩棱斯克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梅尼希科夫就在给马林科夫的信中写道：“1945—1946年间我就地碰到了许多情况，考察了布良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州一些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我所看到的事情迫使我给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写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非常难受地听到集体农庄庄员在谈论这样的问题：‘您知道集体农庄不久就要解散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无力再生活下去’。确实，在一些集体农庄生活坏得已不能忍受，如在（布良斯克州的）‘新生活’集体农庄，几乎有一半庄员已经2—3个月没有面包了。部分人连土豆都没有。该地区其他集体农庄有一半情况也不好。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这个地区。”

苏联将军们在私下交谈时对集体农庄制度提出了抨击。1946年12月，瓦·尼·戈尔多夫上将对自己的副职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将说，使他改变对生活看法的原因是：“我相信，如果今天取消集体农庄，明天就会秩序井然，就会出现市场，就会什么都有。应该让人们活下去，他们有权活下去。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用生命保卫的！”雷巴利琴科少将则回应说：“集体农庄的粮食被搞走了，什么也不剩，连种子也吃光了……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集体农庄庄员痛恨斯大林，都等待他完蛋。”

然而，斯大林无意于改革，他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战争胜利是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1946年2月9日，他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他还用回忆的方式对党内曾经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的人给予批判：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集体化政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正确的，因而是不容改变的，这样一来，二战后对包括集体农庄制度在内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就被彻底排除，变革之门被紧紧封闭，苏联丧失了一次改革契机。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随后波匈事件的发生，苏联农民期盼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再次彰显出来。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了解苏联农民对于集体农庄制度的态度，可是，他只是对苏联农业政策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采取一些措施调整集体农庄庄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从而使苏联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实质。虽然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但是，国家收购各种谷物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仍旧由政府决定，而不是由集体农庄庄员自己来决定，更不是由市场来决定，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存在市场经济，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活动过程和生产活动内容，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这一本质没有变化，他们对国家的依附地位没有改变。因此，当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时，赫鲁晓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集体农庄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而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精力花在集体农庄上，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他还声称“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亲切的家”。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并没有从根本和实质上触及集体农庄制度，也就无从谈起去突破这一制度了。

一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虽曾在形式上略有变化，但是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安排自己的生产、更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长期受遏制的基本状况不曾发生改变，这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并且直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发出警告：“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85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客人时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拒绝、拖延改革，就意味着僵化，僵化则意味着活力和生命力的丧失，因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实际上是早就注定了的。

档案与史实

“十年携手共艰危”

□李秀潭

收藏据说讲究缘分。

金秋叶红时节，笔者偶去报国寺，竟然意外地在地摊发现一方许广平先生藏书印。

藏书印寿山芙蓉石质，如脂，如玉，晶莹温润。印文篆书“景宋阅读”，格调凝重，苍劲老辣。边款：“庚寅二月为景宋先生方家治印并希指正”，落款“都昌张叔愚刻”。

景宋，许广平先生笔名。许广平母亲姓宋，澳门商人女儿，懂医道，擅诗词。许仰慕母亲才智，故以景宋为字，后作笔名。张叔愚，青岛昌邑市区都昌人。上世纪30年代即名蜚书坛，黄宾虹、刘海粟、赵朴初等大家皆慕名求印。当时中青年篆刻者以做其弟子为荣，犹如国民党军官称自己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样。此印为1950年（庚寅）刻制。

许广平，鲁迅先生夫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先辈、作家、社会活动家。

许广平先生出生在广东一个既带浓厚封建色彩，又开放进取的大家族。家族既给她留下旧礼教的伤痕，也给了她奔放开朗的性格。在广东近代革命氛围熏陶下，受兄长影响，她从小就怀有民主革命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五四”运动前，为挣脱封建婚姻的桎梏，她先后前往天津、北京求学。“五四”运动中，她与邓颖超、刘清扬等人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编辑《醒世周刊》，采用补习学校、家庭讲演等各种形式，组织各界妇女参与封建斗争。1925年北京女师大爆发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及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许广平以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积极投入运动，成为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学生运动领袖。而正是在女师大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许广平和鲁迅甘苦与共，携手战斗，他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几年之后，他们在上海开始了“十年携手共艰危”的共同生活。从此，许广平成为鲁迅在黑暗抗争中以沫相濡的战友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助手。从这时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这10年间，许广平毅然牺牲自己，全力协助、照料鲁迅的工作和生活，帮鲁迅查找资料，抄写稿件，校对译著。同鲁迅一起面对各种反动势力的压力，与之作坚决的抗争，使鲁迅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能够得到一份家庭的温馨体贴。而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间，之所以能够创作两倍于前20年的业绩，无疑与许广平的悉心照料、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鲁迅生前经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1934年12月9日，鲁迅将三集《芥子园画谱》赠送给许广平，并在首册扉页上题写了那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赠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这首诗集中表达了鲁迅与许广平风雨同舟、生死相依的深情。

鲁迅先生逝世后，在上海“孤岛”时期，许广平在兵燹战祸中，用全部精力保护鲁迅遗产，抚养鲁迅遗孤，完成鲁迅未竟事业，整理出版鲁迅文集。1938年，她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复社出版社和进步民主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与胡愈之、郑振铎等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名义，主持编辑出版了600万字的《鲁迅全集》，收录了当时已经发现的全部著译，共20卷。当时《全集》出版，除国民党内政部审核登记横加干涉习难外，关键是缺乏经费。对此，除复社社员集资外，主要采取预约售书的办法解决。许多进步人士亲往海内外预售。据许广平回忆：华南方面得茅盾、巴金等先生热心号召，汉口方面得邵力子、沈钧儒诸先生特予介绍，国外方面美国由陶行知先生推动。而一切擘画策动，则全赖胡愈之先生。当时周恩来领导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帮助，很快预售二三百部，从而解决了《全集》的出版资金问题。《全集》的出版，“目的在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许广平《编校后记》）。同时，更为后人抢救保存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一精神遗产，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这是许广平先生对中国以至世界独特的伟大贡献。

在风雨如晦的岁月，当时党组织考虑到许广平的安全，曾建议她转移至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也有友人劝她以教书为掩护，到南洋郁达夫处工作。但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遗稿及生前遗物，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留在上海，为此还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和迫害。在生死关头，她坚守“牺牲自己，保全同志；牺牲个人，保全团体”的信条，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生动诠释了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被郑振铎誉为“这是中华儿女们的最圣洁的精神的实型”。在此期间，她还参加了以何香凝为首的抗日救国后援会（何被法租界驱逐出境退走香港后，她成为留守的三骨干之一），组织各界妇女积极参加慰劳、救护、征募、救济、战地服务等工作。关心支持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妇女》月刊和《妇女界》半月刊，撰写配合抗日救亡和回忆鲁迅生平、研究鲁迅著作、阐发鲁迅思想的文章，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及沦陷区万马齐喑的岑寂局面，以实际行动继承鲁迅的遗志，赓续鲁迅的事业。

1948年冬，经组织安排许广平先生到东北解放区。当地东北书店、光华书店曾用纸币支付了一笔鲁迅作品版税，她让儿子海婴将这些纸币兑换成金条，全部捐赠给东北鲁艺。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使鲁迅著作能以较低售价供读者购置，许广平又断然将鲁迅著作的出版权和全部版税上交国家出版总署。同时将历尽艰险保存下来的鲁迅全部书籍、手稿、北京上海故居的遗物，包括中外版画、报纸杂志、生活用品，连同鲁迅先生赠给海婴的全部物件，捐赠国家，以支持和帮助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的筹建，为弘扬鲁迅精神，继承鲁迅文化遗产，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基础。

“文革”前，鲁迅书信手稿主要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为了征集、保存、出版这批书信，许广平和鲁迅生前友好付出了极大努力，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曲折。“文革”爆发后，原文化部文革小组通过北京市委、北京市文化局文革小组和鲁迅博物馆工作组，将这批书信手稿以及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15页手稿调文化部。1967年1月，江青又指使戚本禹用中央文革名义从文化部调走这批手稿，一时下落不明。许广平担心这批手稿遭到破坏，十分焦虑。1968年2月17日，鲁迅博物馆革命大联合勤务组写信给中央文革，要求追查这批手稿下落，并请许广平转交此信。3月2日，许广平决定给中央写信。3月3日因连日受鲁迅手稿事刺激，在友人凌山家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

许广平先生临终前，曾多次问海婴：“你看我的一生，是否对得起党，是否对得起你的父亲？”古语云：论人处世，要“取人以大，观人于微”。许广平先生作为一位女性，为了鲁迅先生的事业，而作出的那种特殊的无可替代的无私奉献和伟大牺牲精神，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这方面，许广平先生无愧。

札　记